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上海促进消费研究

张勇¹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 200031)

【摘要】：“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单纯扩大总需求，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看，主要是增加发展的主动性，建立发展的新优势。上海应继续扩大自身需求，继续保持自身领先的消费能力和吸引消费的能力；不断提升产业能级，成为满足产业和消费双升级需求的重要供给者；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成为内外循环衔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数据流等生产要素流动的枢纽和战略链接点，充分体现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担当作为。

【关键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居民消费 收入分配 供给侧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21)02-0037-012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全面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研究如何促进消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上海得到较好印证

(一)上海“三驾马车”变动趋势分析

1. 从经济发展动力分析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上海经济发展总体可以分为 3 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1999 年）是投资拉动阶段，这个阶段投资超过消费和外贸，经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投资拉动；第二阶段（2002—2013 年）是外贸拉动阶段，这个阶段进出口总额大幅增长，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外贸拉动；第三阶段（2013 年至今）是内需拉动阶段，最终消费占比超过出口，超过 GDP 的 50%。预计“十四五”期间，上海将形成以消费和外贸为主动力的增长模式。

2. 从外贸依存度分析

上海外贸依存度呈现先上升后稳步下降的总体趋势。上海外贸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步，加入 WTO 后快速上扬，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在 2004 年达到顶点，当年外贸依存度约为 177%；在 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快速下降，随后出现反弹，2011 年后逐步回落，2019 年外贸依存度为 89.23%，比最高峰时下降了 88%。从全国情况来看，2006 年我国外贸依存度达到历史最高点 67%，之后缓慢下降，2019 年降至 30%左右。目前，上海依然是全国外贸依存度最高的省级城市，其次是北京，2019 年为 81.30%。

3. 从出口依存度分析

2002 年前后，上海出口迅猛增长，超过最终消费，2004 年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2013 年出口占 GDP 比重已经低于最终消费。从

作者简介：张勇，管理学博士，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高级经济师。

全国情况来看,1993 年以后,全国进出口额每年都是顺差,最高的年份顺差在 GDP 占比达到 9%以上。与全国情况不同的是,2011 年后,上海外贸净出口额转负,逆差逐步扩大。

4. 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分析

1992—1996 年,投资对 GDP 拉动明显,1996 年投资占 GDP 比例为 65. 5%,这个时期正值浦东开发开放起步阶段。1999 年后,投资低于出口和最终消费,2009 年后,投资进一步回落,低于居民消费,2017 年,这一比例为 23. 7%,接近发达国家水平。

5.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近年上海经济发展中得到较好印证

从“三驾马车”变动趋势上看,进出口对上海 GDP 拉动作用逐步回落,内需逐步抬升,已成为 GDP 增长的主要动力。上海经济发展也表现出自身发展的先导性和特殊性:一是上海 2009 年后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已超过 50%,比全国早 3 年;二是外贸依存度峰值出现比全国早 2 年左右;三是外贸“逆差”持续扩大;四是外贸依存度依然较高,2019 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60%,上海发展更容易受到国际市场和外部需求影响;五是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变动趋势的国际比较

1. 美国、日本与中国及上海消费比较

美国最终消费(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之和)自 1970 年代以来基本保持平稳,总体保持在 GDP80%左右。日本 1975 年以前低于中国,1980 年代与中国基本持平,1990 年到达低点,约占 64%,此后逐步上升,2017 年约占 GDP75%。1987 年日本人均 GDP 达到 2 万美元,1992 年达到 3 万美元,从日本经验看,从人均 GDP2 万美元迈向 3 万美元的过程中,最终消费经历了见底回升的转换。目前上海正处于这一阶段,由于中日两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相似性,最终消费和居民消费的逐步提高可能是上海必经的发展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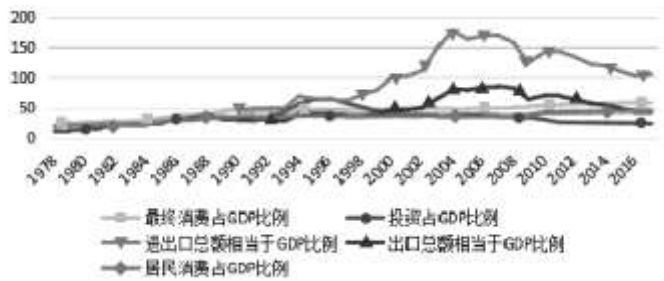


图 1 上海最终消费、进出口、投资占 GDP 比重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上海历年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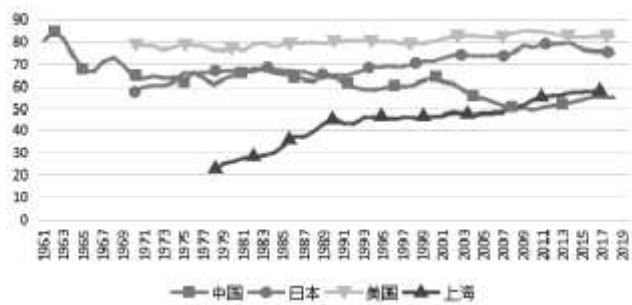


图 2 中、美、日以及上海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上海历年统计年鉴。

2. 我国最终消费变化趋势

我国最终消费总体呈现探底回升过程,改革开放以前保持在 60%以上,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逐步下降,2010 年达到低点,约占 GDP49%,此后开始逐步回升,2018 年约占 55%。

3. 上海最终消费变化趋势

上海总体呈现缓慢上升趋势,2008 年,最终消费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9 年最终消费超过 50%,2017 年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 个百分点左右。其间经历了两段比较快的增长期,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至 1990 年,二是 2008 年至今,总体上增长较快。

4. 我国及上海最终消费趋势的国际比较

从国际比较分析,2017 年我国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比美国低 27.6 个百分点,比日本低 20.2 个百分点,上海比美国低 25.2 个百分点,比日本低 17.8 个百分点,说明无论全国还是上海,最终消费占比仍然有较大提升空间。

5. 中外统计方法差异

关于中美统计方法差异的争论,有研究^[1]分析了中国和美国 GDP 统计方法的差异,由于存在虚拟房租等因素,一般认为我国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比实际情况低估了 10%,即使考虑统计方法的差异,目前我国最终消费占 GDP 比重仍然比美国低 17 个百分点,比日本低 10 个百分点,上海则相应低 15.2 个百分点和 7.8 个百分点。

(三)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变动趋势的国际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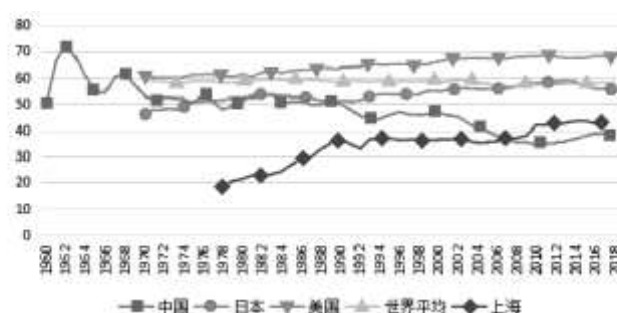


图 3 中、美、日、上海以及世界平均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上海历年统计年鉴。

1. 中国居民消费水平国际比较

从全球平均水平来看,1970—2018 年,居民消费(及为其服务的非营利组织)占 GDP 的比重是稳定的,基本稳定在 57%~60%。

在世界 GDP 排名前 10 位的经济体中,生产力导向型国家的中国、德国、法国、日本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日本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从 47%提升到 58%(接近世界平均水平);德国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基本稳定在 52%~57%;法国基本稳定在 53%~58%,接近世界平均水平。消费导向型国家的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意大利、巴西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美国这一比例有稳步上升趋势,逐步从 60%增加到 68%。美国居民消费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居民消费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是两个极端。中美两国在需求和供给方面的再平衡直接影响了世界经济的总体格局。

2. 中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分析

从全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分析可以看出,该占比总体呈现逐级回落,探底回升的趋势,低点出现在 2009 年左右。2017 年我国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比美国低 29.8 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低 19.3 个百分点。

3. 上海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分析

从上海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分析可以看出,2007 年上海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17 约为 4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3.8 个百分点,比全球平均水平低 15.5 个百分点。

(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上海发展提出新要求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不仅是单纯扩大总需求,从全球经济平衡的角度看,主要是增加发展的主动性,建立发展的新优势。首先国内形成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相互促动的国内大循环格局,各个地区在这个格局中寻找自身定位,并不谋求各自形成自身的内循环,在此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和国际循环,形成国内和国际双循环互动的格局。上海应当继续扩大自身需求,继续保持自身领先的消费能力和吸引消费的能力;不断提升产业能级,成为满足产业和消费双升级需求的重要供给者;进一步加快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成为内外循环衔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数据流等生产要素流动的枢纽和战略链接点,充分体现在新发展格局中的担当作为。

从居民消费特点来看:一是今后一个时期,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会逐步提升,但不会像投资和外贸以爆发式的增长出现,从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看,日本在跨越人均 GDP2 万美元之后的 30 年中,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提升了大约 9 个百分点。二是在扩大内需的两大变量投资和消费中,我国长期以来习惯于通过扩大投资作为逆周期调节工具,形成了一套运作顺畅的投资拉动政策工具箱和强有力的执行机制。居民消费是顺周期变量,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作为逆周期调节经济的具体抓手不多,扩大居民消费主要是通过短期刺激政策和结构性改革措施来解决需求总量和中长期发展失衡问题。三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跨周期政策设计,需要逐步建立一套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投资与消费相互支撑的政策框架和执行机制。

二、上海居民消费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劳动者报酬占比较低

根据联合国测算,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美国为 53.3%,德国为 51.8%,日本为 50.5%,中国为 51.8%,根据上海统计年鉴计算,上海为 43.4%。劳动者报酬占比的高低一方面取决于国民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产业结构,一般来说,在农业或者服务业占比高的国家和地区,该比例一般较高。从变动趋势分析,上海劳动者报酬(劳动者所得)占 GDP 比重稳步上升,营业盈余(企业所得)呈总体下降趋势,生产税净额(政府所得)总体稳定,近年来随着减费降税各项政策的出台,有生产税净额下降,营业盈余增加的势头。总体而言,上海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呈现“劳动友好型”特征,但是应当继续提升劳动者报酬的占比。

与国内主要省市相比,上海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上海劳动者报酬占 GDP 比重低于北京(比北京低约 8 个百分点)、广东和浙江;而政府所得部分占比在 5 个省市中最高(比北京高约 6 个百分点),上海强政府、强财政的特点突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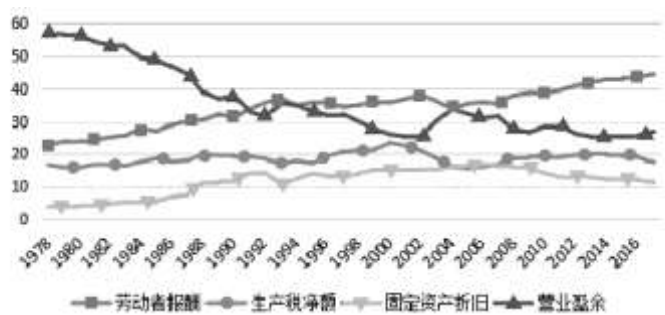


图 4 上海国民收入结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上海历年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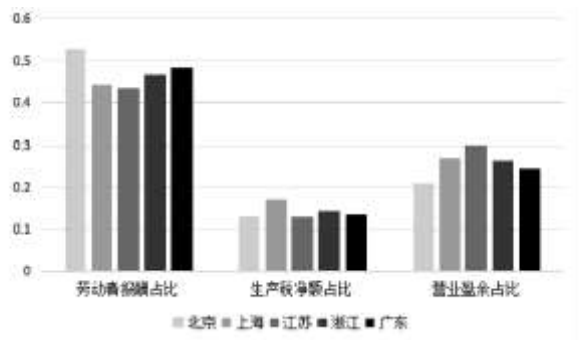


图 5 京沪苏浙粤国民收入结构比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上海统计年鉴。

(二)居民可支配收入占 GDP 比重增长乏力

从人均 GDP 和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分析,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总体高于人均 GDP 增速;从 2012 年以来,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人均 GDP 增速基本同步,比重一直落在 46%~48%之间,2018 年这一数值为 47.5%;发达国家该比值一般在 60%左右,美国为 63%,德国为 57%,日本为 45%。

(三)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短板

从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分析,上海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转移收入占比较高。与国内主要城市和美国相比,在工资性收入占比方面:上海比美国低 3.48 个百分点,比北京低 2.57 个百分点,比广东低 11.3 个百分点;在财产性收入方面:上海比美国低 5.7 个百分点,比北京低 1.96 个百分点;在转移性收入方面:上海比美国高 15.2 个百分点,比北京高 3.62 个百分点,比广东高 18.1 个百分点。“离退休金”是居民转移性收入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所占比重在 60%~70%之间。上海居民转移性收入高的主要原因是上海人口老龄化严重,离退休职工多,与上海类似,国内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上海的辽宁转移性收入也高于上海。

从上海居民可支配收入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动趋势分析:工资性收入总体呈下降趋势,转移性收入稳中有升,与工资性收入有互补性,两者合计约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 90%左右,但是财产性收入增长乏力。财产性收入主要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产生的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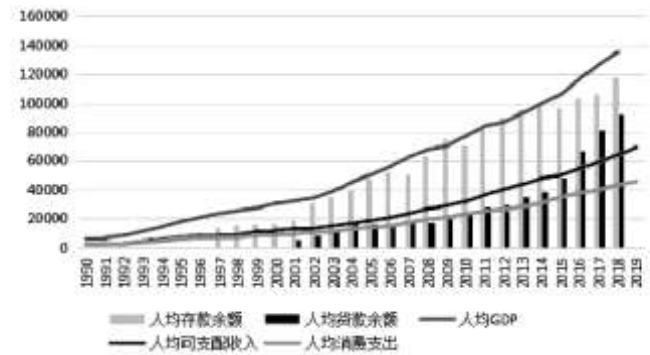


图 6 上海人均 GDP、收入和消费、存贷款余额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上海历年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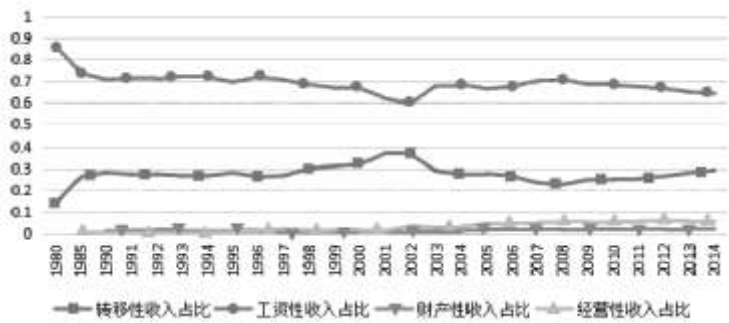


图 7 上海居民可支配收入构成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上海统计年鉴。

(四)消费倾向有待提高,消费增速波动性强

平均消费倾向(可以用人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表示)主要反映“敢不敢”花钱的问题,它受到收入预期、人口结构、消费文化、收入分配结构、物价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平均消费倾向来看,全国为 70.3%,上海为 65.67%,也就意味着上海每收入 100 元,可能支出 65.67 元。从全国主要城市 2019 年消费倾向比较发现,上海总体上处于中上等水平,成渝地区以及珠三角城市比长三角城市更敢花钱,也可以认为长三角地区的消费潜力更大。

分析 1990 年以来上海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一是消费与 GDP、收入总体呈现同向变动,人均消费支出增速波动幅度高于人均可支配收入。一般认为,可支配收入与消费支出是长期均衡的因果关系。2005—2012 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快于人均 GDP 增长,2007—2015 年,人均消费支出也快于人均 GDP 增长,2019 年,消费支出增速开始下降。二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动领先人均消费支出 1~2 年。三是消费支出是顺周期变量,2015 年出现逆市上扬走势,可能与房价快速上涨引发的被动消费有关。四是预期对人均消费支出有较大影响,在收入预期下滑时,消费支出会更大比例下滑。

2020 年上半年,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 3.6%,并未出现负增长,但是人均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10.7%。稳定经济和收入预期是稳定和扩大消费的重要手段。随着经济修复,存在出现“报复性消费”的可能。

(五)收入分配差距有扩大倾向

1. 中等及以上群体收入增长较快

不同群体收入分配有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就全国而言,2016 年基尼系数为 0.465。从上海不同收入群体的增幅看,收入差距有扩大倾向,中等收入及以上群体收入增长较快,其中增长最快的是中高收入群体(2000—2017 年,收入增长 412%),其次是中等收入群体(增长 390%)、高收入群体(增长 375%)、中低收入群体(增长 353%)、低收入群体(增长 279%)。

2. 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人群消费倾向下降较快

2000—2014 年,上海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倾向下降最快,中等收入群体其次,之后依次是低收入群体、高收入群体和中高收入群体。换句话说,最敢花钱的是低收入人群和中高收入人群。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具有刚性,而中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体可能不安全感更强,在面临住房(百万级消费)、汽车(十万级消费)等金额较大的消费升级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储蓄和更长时间的积累。

(六)资金高杠杆率限制了居民的消费空间

从资金杠杆水平来看,一是上海居民部门资金风险总体可控,二是上海居民杠杆率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依靠居民部门加杠杆扩大消费的空间有限。资金杠杆率有两种统计口径:一种是住户部门资金杠杆率,居民贷款与 GDP 之比,上海住户部门杠杆率为 68%;另一种是居民资金杠杆率,居民贷款与居民存款之比,上海居民资金杠杆率为 78%。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和中国人民银行数据,目前发达经济体住户部门资金杠杆率平均为 72.1%,新兴市场经济体平均为 39.9%,国际平均水平则为 59.7%。

2015 年以来,上海住户部门贷款新增增速远快于存款新增,杠杆率快速提升,2018 年有所减缓,但并未扭转趋势。控制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融资规模等因素后,居民杠杆率每上升 1 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会下降 0.3 个百分点。^[2]上海居民贷款余额增速与上海房价走势高度相关,居民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主要是房价过快上涨引起的。

(七)居住消费支出过高,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不足

上海消费升级,逐步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变,逐步从必需品消费向非必需品消费转变。随着消费总支出增加,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等支出占比增加,食品、衣着、生活用品等支出占比逐步下降,从恩格尔系数的角度看,上海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美国商品和服务消费大致是 3:7 的结构,日本平均服务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 44%,而东京(二十三区,下同)平均服务消费支出占总支出的 51%。与居住相关的消费支出(主要是租房支出)是上海市民家庭消费支出的首要因素,占比比东京高 20.1%,居住支出过高对其他消费存在挤出效应。上海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不足,比东京大约低 6%。2018 年,上海居民消费支出主要是居住(32.8%)、食品(24.7%)、教育文化娱乐(11.6%)、交通通信(11.3%)。2019 年,日本居民消费支出^[3]主要是食品(30%)、交通通信(15.9%)、文化娱乐(11.8%)、居住(8%)、医疗保健(5.2%);东京居民消费支出主要是食品(30.6%)、文化娱乐(12.9%)、交通通信(11.9%)、居住(11.5%)、医疗保健(5.29%)。2015 年,上海市统计局对消费支出统计口径进行调整,2015 年之后数据与之前数据不具有完全的可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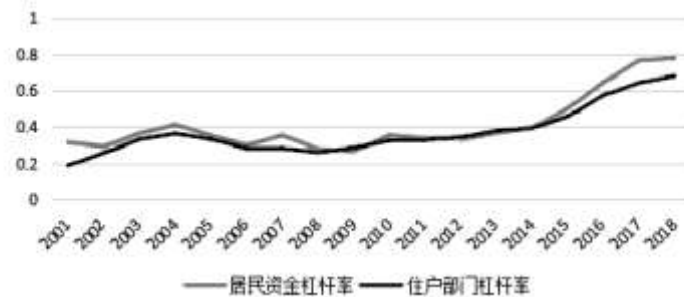


图 8 上海居民杠杆率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上海历年统计年鉴。

从消费支出的地区差异看,东京比全日本平均家庭消费支出高 10.9%;上海人均消费支出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118%。巨大的消费地区差异提示加快提高城市化水平、推动区域一体化在有效扩大内需方面有巨大潜力。

(八)抑制、回流与新增的消费需求未满足

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和中国“双循环”发展的总体格局下,部分抑制、回流和新增消费需求蕴藏着新的市场。

1. 进口替代产生的需求

未来中国由“出口导向”转向“进口替代”,是中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内在需求。从中国进口商品规模来看,排在第 1 位的是集成电路(2019 年进口 21079.5 亿元,下同),其次是汽车(3339.4 亿元)、医药品(2462.3 亿元)、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2238.2 亿元)、汽车零配件(2111.9 亿元)、飞机(1086.8 亿元)等。中国从美国进口排名前 3 位的商品是航空器、航天器及其零部件类、发动机类以及棉花;从德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动车辆及附件(32.0%)、医药产品(24.5%)、医疗器械(17.9%);从日本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机械车辆零部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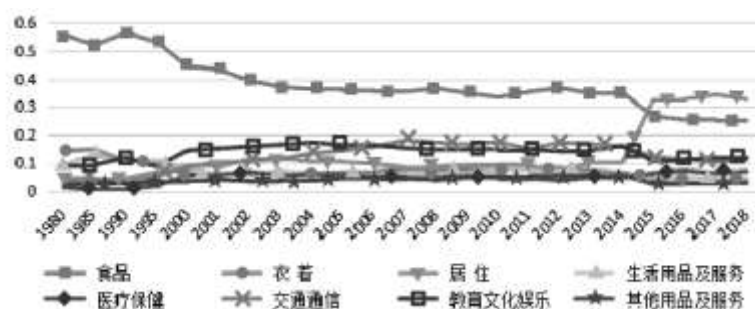


图 9 上海消费支出结构变动趋势

数据来源:上海历年统计年鉴。

2. 消费回流产生的需求

未来,中国居民境外消费的回流将成为重要的全球消费市场趋势变化之一。如果国内高品质消费供给能够得以改善,海外购物、海外教育、海外旅游等消费回流将日益增加。这一市场主要体现在服务贸易项下存在较大贸易逆差的旅行(2373 亿美元)、运输(660 亿美元)、知识产权(300 亿美元)、保险服务(70 亿美元)、文化娱乐视听(51 亿美元)等领域。

3. 受到限制的消费需求

受限的消费需求主要是指受到车牌拍卖和交通管制措施限制的汽车消费、开放程度有待提高的金融保险市场和信息文化娱乐市场、住房消费中合理的改善型需求。这些需求是在居民满足了基本衣食住行后消费升级的必然诉求,随着管理水平提高和对外开放的扩大,将逐步形成新的市场。

4. 科技进步与新供给创造的新需求

随着数字经济和新基建不断发展,以非接触式为代表的新生活方式和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生产方式将催生大量新的消费需求。

5. 内外循环衔接带来的新需求

除了传统的出口和投资外,还可能从3个方面产生新的需求:一是国内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需求,各类资本、数据、技术配置或者交易中心将落户不同的城市;二是与国际规则进一步接轨,吸引国际资本、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入国内,为国内大循环赋能带来的需求,主要体现在自贸试验区以及特殊功能区的改革和推进;三是全球资产配置和企业主动“走出去”带来的新需求,主要体现在金融业扩大开放、金融科技的突破、国际化金融、保险、财富管理机构集聚以及海外投资体系日益完善等方面。

三、扩大消费的理论及政策实践^{[4][5][6][7][8]}

长期需求不足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普遍问题,综合多个经济学派,理论上扩大内需的办法:一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占GDP比重;二是提高消费倾向,降低储蓄率;三是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消费总量;四是扩大政府投资和公共消费支出;五是居民部门加杠杆,适度提前消费或者透支消费;六是供给侧改革,供给引导和决定消费;七是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配合财政实现结构性目标,调整资产价格和收入分配;八是作为一个地区,存在消费行为的空间集聚以及内外循环衔接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数据流等生产要素流动的功能定位和路径依赖问题。

各国采取了多种扩大消费政策,主要包括以下措施:

一是发放消费券。1999年3月,日本为了刺激消费,向特定人群(主要为15岁以下儿童、65岁以上老人)发放名为“地域振兴券”的消费券,每人发放2万日元(约合200美元,使用期限6个月)。该措施对半耐用品(即能使用一段时间的消费品,如大部分纺织品、服装、鞋帽、家具等。消费者不需要经常购买,但是在购买时要认真挑选)有明显的正向刺激作用,据测算,最终有25.2%用于新增消费。

二是发放现金。2020年,日本政府为包括住在日本的外国人每人派发10万日元的现金。参考25%的转化率,理论上可增加占日本GDP1.1%的个人消费。2020年,美国推出5600亿美元直接补贴给家庭与个人,占美国GDP的2.9%;加拿大给居民现金补贴475亿加元,占加拿大GDP的2.3%;澳大利亚的居民现金补贴为249亿澳元,占澳大利亚GDP的1.3%;新加坡的居民现金补贴为59亿新元,占新加坡GDP的1.3%;印度的居民现金补贴为1.7万亿卢比,占印度GDP的1.2%。德国拿出500亿欧元,占德国GDP的1.5%,补贴给中小企业及个体户。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和实证研究大多认为:发达国家在使用财政刺激消费方面,使用税收返还或类似的现金发放政策更有效。

三是推动商旅文与假日经济。日本不断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制定优惠政策开展“一村一品”运动,中央、地方、民间团体共同开发旅游景点、土特产品或示范工程等。日本政府还通过修改节日法,尽可能将国家法定假日与双休日连在一起,形成“三連休”“五連休”和“黄金周”等长假期。据测算,旅馆业和餐饮业在有连休周末的营业收入,要比没有连休的双休日高出 10%~20%。

四是减税和个人税返还。美国分别在 2001、2008、2009、2020 年推出了多轮个人税返还政策。研究表明,美国居民在收到支票的半年内,2/3 的返还额会支出,缺少流动资产或者低收入家庭使用比例显著偏高。日本政府也推出多轮个人减税政策,同时加大对住房消费税等相关税收的减税力度,把土地贷款和住房交易损失等也纳入减税范围。

五是补贴特定产品。选择补贴的消费品一般考虑产业链长、消费金额大的消费升级产品。美国政府于 2009 年 6 月通过一个为消费者报废旧车并购买新车提供补贴的法案,俗称“现金换旧车”项目。研究表明该政策只是将 7~9 个月内有购车计划家庭的购车行为提前到项目实施的 2 个月内。据统计“次贷”危机期间,至少有 15 个国家实施了类似措施。

六是宽松的金融与信贷。主要包括两类措施,一是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日本最早实施量化宽松政策,2001 年,日本央行通过对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迫使银行在较低的贷款利率下对外放贷,进而增加整个经济体系的货币供给,促进投资和消费。在随后的次贷危机和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和欧洲推出多轮量化宽松政策。二是积极推动消费信贷发展。美国主要通过消费信贷扩大个人消费需求。随着美国消费文化的兴起,分期付款、信用卡等金融产品的创新,大大推动了消费金融的发展,政府主要是通过立法建立消费者保护、个人征信、风险管理、个人破产等制度。美国消费信贷一级市场日趋饱和后,消费信贷二级市场应运而生。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消费信贷余额近 20 万亿美元,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管,过度金融创新最终引发“次贷”危机。

七是新供给形成新需求。美国克林顿政府推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极大地推动了企业投资,开启了信息消费时代。日本政府制定严格的产业和产品的节能技术标准,促进各行业不断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引发新产品消费高潮。日本还抓住数码产业发展机遇,自 20 世纪末开始,以数码相机、DVD、平板电视等为代表的新产品在日本乃至全球热销,被誉为“数码景气”。

八是鼓励生育。2017 年日本提出了“育人革命”的政策基本框架。今后无论父母年收入多少,3~5 岁幼童入园入托政府都将提供支援,实现新增 200 万幼儿免费入园入托。政府还对每天幼儿园结束后到家长下班回来为止这段时间孩子的去处提出了《放学后孩子的综合计划》,计划到 2019 年末为止,确保完成收容 30 万幼儿园放学后孩子的设施。此外,低收入家庭的 0~2 岁幼儿也将享受到免费入园的待遇。据测算,年轻育龄夫妇将省去一个幼儿每月 2000~3500 元人民币的开销。

九是收入倍增。1960 年,日本通过《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提出在 10 年内国民生产总值增加 1 倍以上,GDP 年增长率为 7.2%;主要内容为充实社会资本、产业结构现代化、促进贸易与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人的自主能力与发展科学技术、实现社会稳定等。至 1967 年提前完成翻一番的目标,也造就了“一亿总中流(中产阶级)”社会。

十是缩小收入分配的地区和阶层差距。日本推出农村改革与新农村振兴运动,提高农民收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企业采取终身雇佣制度,限制经理人薪酬,限制股东分红;采取高额遗产税、赠与税、固定资产税等;政府还运用财政资金对社会保险提供支持,提高高龄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以此达到刺激全社会消费的目的。改革初期起到了缩小收入差距作用,1990 年代以后,由于资产分配不平等加剧,以及大量雇佣非正式员工,作用逐步弱化。

总的来看,日本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自 1990 年代以来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增长了约 9%,但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作用是有限的,其主要原因是人口规模减小和老龄化、居民收入和消费预期恶化,一些研究也提出日本内卷化、全球日本化^[9]的观点。美国扩大消费相对成功的原因,可能是年轻的人口结构,超前的消费文化,技术、美元和军事方面的霸主地位等。

四、促进消费的对策建议

(一)转变观念,树立以内需为战略基点的新发展理念

从全球经济再平衡和逆周期调节方式上看,中国主要是超前投资,形成新的生产和供给能力,美国是超前消费,引导和决定全球需求。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往往需要压低劳动者工资以提高产品竞争力;基建推动型的增长必然强化政府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房地产为主的投资驱动也会挤出居民其他消费。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应当平衡好消费和投资、外贸的关系,进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率,增强经济发展的主动性;完善扩大消费的短期和中长期政策工具,在逐步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坚定推进结构性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二)提高居民收入,完善收入分配结构

将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中等收入群体数量、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作为重要发展指标。

1. 应当继续提升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居民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

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利息、股息和出租出借收入。要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稳定强制分红机制,增加机构投资者比例。规范和完善各类出租出借市场,进一步发展金融、保险和财富管理市场,进一步深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建立受益面更广的非劳动因素参与分配的市场化机制。

2.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国家统计局将中等收入标准设定为三口之家年收入10万~50万元人民币,如果以个人为标准,按照2018年统计口径计算,上海有60%以上的人口可以纳入中等收入群体,中低收入人群已经接近这一标准,如果按照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速6%计算,预计2020年,80%的上海人口可以纳入中等收入群体(如果以家庭为标准,可能会低于上述比例)。如果按照年均5%的增速,2030年,目前低收入群体将进入中等收入标准。建议综合考虑物价和支出情况,设立适合上海情况的中等收入标准,重点关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群体。

(三)面向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消费潜力释放

坚持上海收入高一点、消费高一点的定位。一是坚持“房住不炒”,防止房价快速上涨。二是积极推进消费升级,特别是服务消费升级。从发达国家消费趋势看,耐用品和非耐用品消费占比先降后稳,服务消费占比则稳中有升。消费者更愿意增加服务类消费,尤其是与健康、自我提升和体验相关的服务,建议积极发展知识信息领域、文化娱乐体验等精神领域、财富管理、金融保险领域以及大健康领域消费。三是积极发展适应新生活方式的消费。增加无接触式生活方式带来居家办公、宅经济、线上消费、线上教育和医疗、线上政务等服务供给;适应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带来的银发经济、一人经济等趋势。四是积极发展适应新生产方式的需求。消费趋势的转变将带动企业对人工智能、5G和物联网技术的需求和依赖,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服务和工厂自动化等产业将加速转型,积极推进数字化服务和消费。五是不断创新商业策略和模式。坚持“人无我有”,大力发展首店、首家、首个、首台套经济;坚持“人有我优”,强化“四大品牌”建设,积极引导“新国货”潮流,积极发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全渠道模式,探索日本的药妆店模式等;坚持“人优我廉”,大力发展免税经济和平台经济,促进海外消费回流和消费市场下沉。

(四)加快供给侧改革,畅通内外循环衔接

一要加快进口替代。集中发力集成电路、汽车及零配件、医药品、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大飞机等。二要推进服务贸易领域制度型开放,加快高品质服务供给。结合上海自身优势,应重点关注金融、信息、文化娱乐、教育和健康领域的开放。综合考虑经济基本面、人民币汇率、中外利差、金融业对外开放、居民财产增加等因素,金融业扩大开放最值得期待,国际资本有

望持续大规模流入。建议继续加强金融机构、财富管理机构、资产管理机构的集聚,积极扩大在岸市场的对外开放,有序推进资本项目对外开放。此外,应积极推进免税经济和市内免税店发展、推进优质中外合资办学和办医,借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扩大电信服务机构和业务范围的开放,扩大文艺表演团体和娱乐市场开放。三要深化改革,畅通内外循环衔接:加快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增加农民以及技术和数据等新要素所有者的财产性收入,争取数据、技术等新生产要素全国性交易中心落户上海;推进自贸试验区与国际规则进一步接轨,加强临港新片区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在规则方面的衔接,加强对长三角的辐射带动,推动长三角整体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国有资本管理机制,积极培育新型跨国企业和平台型企业,积极推进海外投资,发展服务贸易,提升“外循环”对“内循环”的贡献。

(五)立足长远,解决好三大结构问题

促进消费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重要的社会治理问题,要重视解决好城乡结构、人口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三大问题。一是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从全国情况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的 2.68 倍,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的 2.15 倍,长三角城市群 68%的城镇化率低于粤港澳城市群 85.2%的城镇化率,加快推进城镇化仍然是当前扩大内需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建议进一步加快新城建设、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完善“人、地、钱”挂钩机制。二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人口规模减小和老龄化加速,将导致储蓄率下降,社会福利负担增加,长期看会导致内需增长萎缩,建议积极完善户籍制度改革,及早采取鼓励生育措施,加快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增强人才的流动性,吸引全球高端人才集聚,探索以城镇化延缓老龄化的动态平衡机制。三是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结构。积极扩大就业,加大对低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数量,防止收入分配不平等和财产占有不平等加剧。

参考文献:

- [1]朱天,张军. 破解中国消费不足论的迷思[N]. 中国经济时报, 2012-09-06.
- [2]中国人民银行:2019 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EB/OL], 2019-07-29.
- [3]Family Income and Expenditure Survey, Statistics of Japan, <https://www.e-stat.go.jp/>.
- [4]蒋奕,郑筱婷. 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效果如何?——来自各国的经验[J]. 经济资料译丛, 2016(4):8-12.
- [5]崔岩. 90 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与政策调节[J]. 日本研究, 2001(1):1-9.
- [6]中华日本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日本蓝皮书:日本研究报告(2020)[N].
- [7]尹清非.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居民消费结构探析[J]. 消费经济, 2006(8):89-93.
- [8]孙敬水,黄秋虹. 日本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基本经验及启示[J]. 国际经贸探索, 2013(4):35-49.
- [9]清和. 如何摆脱内卷化?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